

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坚决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

端正路线 加强团结 面貌大变

新华社杭州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电
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广大职工坚决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重要指示，认真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以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武器，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分裂党、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罪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革命团结，振奋了革命精神，使全厂革命、生产蓬勃发展。

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是我国最大的丝绸联合企业之一，是浙江省有名的“老大难”单位。如今，它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全厂初步形成了一个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的政治局面。革命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最近两个月来，全厂生产稳步上升，七月份白厂丝、绸缎、印染绸的产量一句比一句高。八月份，全厂又超额百分之十一·七四完成了总产值计划，产量比七月份增长很多，质量也有所提高。这个厂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事实说明：只要不折不扣地落实毛主席、党中央的重要指示，端正思想和政治路线，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即使较长时间以来是一个“老大难”的单位，革命和生产也是能够很快地跃上去的。

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一度成为“老大难”单位，原因在哪里？这个厂的职工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过程中，联系厂里实际，清楚地看到，“老大难”，难就难在没有贯彻好党的基本路线，受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派性的干扰、破坏。要改变“老大难”面貌，必须把路线搞对头，坚持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狠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派性，端正、狠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前一段时期，厂里个别坏人极力推行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明目张胆地歪

曲党的基本路线，胡说什么厂里的主要矛盾是“新干部和老干部的矛盾”，是“这一派和那一派的矛盾”，转移斗争大方向，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影响了职工内部的革命团结，挫伤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革命、生产上不去。最近以来，全厂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认真学习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开了这种反动谬论的实质。大家认识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歪曲这个主要矛盾，就是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以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职工们纷纷表示：“党的基本路线忘不得，头脑里阶级斗争的弦松不得，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停不得。”

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最近，这个厂掀起了群众性的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热潮。他们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三项基本原则，坚决按照党的基本路线办事，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坚决地揭露和打击，对于人民内部的是非问题坚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千千万万恨集中到刘少奇、林彪身上。

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的干部、群众还自觉地维护革命团结，同一切不利于团结的言论和倾向作斗争。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教导，深入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许多工人都说：“我们有共同的大目标，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单丝不成线，千万根丝才能织

成绸缎，工人阶级只有捏成一个拳头，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原来由于对某些问题看法不同而相互对立的同志，都主动拆“墙”填“沟”解疙瘩，增强革命团结。丝织车间工人王成荣和陈肖龙，在旧社会两人都是十三岁进厂当童工，是一根藤上的苦瓜；解放后同在一个工厂做工，同进一个干校学习，一直是并肩战斗的阶级兄弟。后来由于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使这一对阶级兄弟变成了“冤家”对头。最近，他们重温了毛主席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教导，认识到两人在旧社会都是挨资本家的皮鞭打，在新社会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没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他们各自做了自我批评，消除隔阂，重新结成亲密的战友。现在，全厂职工革命团结大大增强。他们在政治上互相鼓励，生活上互相关心，生产上互相协作，团结一心，战高温，夺高产，决心把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

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各级党组织，在带领全厂职工落实毛主席、党中央重要指示的过程中，对党员认真进行了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要求广大党员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最近，全厂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通过上党课等活动，重温了毛主席关于党的建设的论述，认真学习了“十大”通过的新党章，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性质、党的纲领和党的基本路线，更加自觉地捍卫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与那种向党闹独立性的、削弱、摆脱和反对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作斗争。许多党员都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带头讲路线，讲大局，讲党性，讲团结，讲纪律，在抓革命、促生产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从封建农奴制到社会主义的伟大变革

新华社记者述评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年来，百万翻身农奴在民主改革的基础上，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了从封建农奴制到社会主义的伟大变革。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

从一九五〇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开始的西藏革命，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百万翻身农奴正以崭新的面貌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并肩前进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今日的西藏，到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西藏人民中空前普及，焕发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巨大物质力量。一九七四年，全区粮食实现了自给，总产量比自治区成立时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八以上，比民主改革前的一九五八年增长了一倍半。牲畜总头数比一九五八年增长了一点三倍。过去连一根火柴也不能生产的旧西藏，现在工业飞跃发展，一九七四年全区已有中小型厂矿企业二百五十多个，比一九六五年翻了三番，工业总产值增长了近三倍。昔日高原上交通闭塞的落后状况也根本改变了，全区已建成了以拉萨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在封建农奴制的废墟上，西藏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也迅速发展起来。过去农奴和奴隶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权利，现在县县社社办起了学校，在大、中、小学校读书的学生已有近二十万人，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了一点七倍。过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奴和奴隶，生活有了根本的改善。一九七四年全区农村集体和个人存款总额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了十五倍多。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卫生事业的发展，过去源于灭亡境地的西藏各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长。据统计，民主改革前的一百多年里，藏族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三，民主改革后的十五年中，净增了三十多万人。

西藏人民在这场战斗历程中所取得的成就是极为辉煌的。回顾一九五九年，百万农奴翻身之日，一些外国反动派曾声嘶力竭地叫嚷：“西藏发生了人间悲剧！”十年前，当西藏自治区宣布成立，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百万翻身农奴行使当家做主权利的时候，帝修反们又恶毒地咒骂说，这是“西藏民族的死亡”。今天，西藏经过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高原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西藏民族以它前所未有的胜利和成就，给了帝修反以迎头痛击！

西藏所发生的变化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普遍真理，社会主义道路是一切民族获得真正解放的必由之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西藏民族的生命线。

西藏革命的实践证明：没有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解放，就没有民族的解放，也就不可能有民族的繁荣和进步。解放前的西藏，在最反动、最黑暗、最野蛮的封建农奴制度和政教合一的僧侣、贵族联合专政下，官家、寺院、贵族三大领主霸占了西藏全部的土地和绝大部分牲畜。被当成“会说话的牲畜”的百万农奴在永无休止的奴役、剥削、压迫下，受尽了人间苦难。农奴们形容他们除了自己的影子以外，一无所有。

一九五〇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驱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西藏回到了祖国各族人民的大家庭。随着西藏的和平解放，党在西藏修公路，办工厂，建医院，兴教育，发放农贷，做了大量群众工作。人民解放军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放下背包就开荒，不增加西藏人民一点负担。

百万农奴从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两种鲜明对比中，开始觉醒起来，开始看到了希望。到一九五九年平叛以前，农奴们要求实行民主的愿望越来越迫切。他们说：“我们看了八年，比了八年，再也不能忍受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了，只有毛主席、共产党才是西藏民族的大救星！”西藏上层反动统治集团对于百万农奴的革命要求，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拼命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一九五九年，以达赖为头子的西藏地方反动政府终于不顾毛主席、党中央长期耐心的教育、等待，背弃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发动了武装叛乱。

(下转第三版)

欢 腾 的 拉 萨

人同我们一起游园，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曾经被拉萨反动地方政权关在郎子监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罗布卡珍，今天一家人穿着节日盛装来到公园，他无比激动地说：“在旧西藏，达赖可以随便把我们关押、杀害，农奴连一个虫子都不如。在毛主席和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百万农奴砸碎了千年铁锁链，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西藏才能换新天。我们一定要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反修防修，保证无产阶级的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据新华社拉萨十日电)

节日的拉萨，红旗似海，歌声如潮。今天，这座古城虽然飘着细雨，但是，穿着鲜艳民族服装的翻身农奴们，一清早就赶着胶轮马车，从四面八方涌向风景优美的人民公园、解放公园、尼雪林卡。两万多各族人民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游园联欢，同中央代表团的同志和西藏党、政、军及拉萨市负责同志一起，热烈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

鲜花盛开的人民公园，充满了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欢乐气氛。《毛主席派人来》的乐曲声在公园上空回荡。中午，中央代表团团长华国锋同志和副团长姚连芳、彭政、司马义·艾买提、宝日勒呼、何正文、孙玉国同志，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分别在任荣、阿沛·阿旺晋美、陈明义、天宝、李本善等西藏党、政、军和拉萨市的负责人陪同下，到公园来向西藏各族人民转达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热烈祝贺和亲切关怀。公园里掌声如雷，歌声震天。各族人民热烈欢迎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代表团同志走到那里，那里就一片欢腾。华国锋团长和中央代表团其他同志，同游园的工农兵群众热情会见，并且一起观看了文艺演出。

各族文艺工作者在园林里演出了具有民族特色的精彩节目。翻身农奴们热情奔放地唱起了西

藏民间的对歌。代表团团员洪雪飞走上舞台，为游园群众演唱了革命样板戏《沙家浜》选段，向各族人民表示祝贺。她唱完以后，又立即系上了藏式花围裙，同藏族文艺战士一起表演了到拉萨以后新学会的西藏“果协”舞，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中央代表团访问过的一些工厂的工人和人民公社的社员，今天又来到园林里同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一起欢度佳节，心情格外高兴。九日下午，华国锋团长冒雨访问了拉萨市城关区反帝公社贫农社员格桑曲珍一家。格桑曲珍激动的一夜没有睡好。今天一清早，她一家人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从十多里外坐着马车来到人民公园。她说：“旧社会，三大领主把我们当作‘会说话的牲口’；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到我们翻身农奴家里问寒问暖。一想起今天的幸福，我就想同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啊！你真是金色的太阳，把翻身农奴的心儿照亮。”从西藏边远地区赶来参加庆祝活动的门巴族、珞巴族、僜人等少数民族代表，满怀丰收的喜悦参加了今天的游园活动。在万恶的封建农奴社会里，他们被三大领主逼进深山老林，过着原始生活，被诬蔑为“野人”。今天，他们同藏族翻身农奴一起走上了社会主义金光大道。在联欢会上，

他们个个心潮澎湃。错那县勒布区济布公社党支部书记旺堆心情激动地说：“过去三大领主不把我们当人待。在毛主席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我们门巴族才翻了身，我这个被诬蔑为‘野人’的人，也当了公社的干部。今天，我们见到了毛主席他老人家一样，我们决心听毛主席的话，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为保卫祖国西南边疆贡献更大的力量。”

在公园里的参天古树上，人们搭起许多漂亮的帷幕，草地上铺着彩色的卡垫，许多工人、人民公社社员和街道居民全家欢聚在这里，欢度节日。解放前只有三千多人的拉萨，沿街乞讨的乞丐有时竟达七千多人。城关区胜利路居民委员会主任任增就是当时的一个乞丐，受尽了凌辱。今天，他穿着整齐的藏袍和长筒皮靴，同他的邻居在人民公园的树荫下搭起了一个大围幕，矮桌和卡垫上摆满了青稞酒、酥油茶和各种食品。他说：“过去的拉萨是领主的天堂，奴隶的地狱。达赖为了享乐，在过去的这座罗布林卡里修建湖心亭。我十四岁就被押着来挖泥背石，从清早干到深夜，连惨了树皮的糌粑也不让吃饱。罗布林卡是我们农奴修建的，可是，平时我们连看也不准看一眼。今天，党和国家领导



九月十日，拉萨各族人民举行盛大游园联欢活动，热烈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十周年。图为中央代表团、自治区领导同志在人民公园和各族群众一起观看文艺节目。

新华社记者摄
(传真照片)

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

——评《水浒传》中的宋江

雅 林

《水浒传》中的宋江，是农民起义的英雄，还是地主阶级的代理人？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这是重大的原则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

维护封建统治 反对农民革命

北宋末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地主阶级对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处处劫掠，伤害百姓”，人民不堪忍受，揭竿而起，“犯上作乱”，到处点燃起反抗的烈火。革命，用暴力反抗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是被压迫人民选择的唯一正确道路。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那两个阶级生死搏斗的同时，统治阶级内部这一派和那一派之间，当权集团和非当权集团之间的矛盾也更加深化了。我们要全面深刻地解剖《水浒传》中的宋江，就要看他对这个时代的各种社会矛盾采取什么态度，要看他是拥护农民革命，反对封建统治，还是反对农民革命，维护封建统治。

宋江出生于封建地主家庭，“自幼学儒”，“长而通吏”，脑子里浸透了儒家反动思想，学会了一套维护封建统治的权术。他怀着一片“报国”的忠心，时时想着能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正道“凌云志”。但是，当权既得利益集团“非亲不用”，使宋江这个下层小吏很难爬上较高的职位，挤进当权集团的行列。不仅如此，在统治阶级内部大狗小狗、饱狗饿狗的争斗中，象宋江这类不“当道”的地主阶级分子，还时常有被咬死咬伤的可能，因此，一心往上爬的宋江，事先就就了“狡兔三窟”：一是准备了藏身洞；二是“教爹娘告了忤逆”，免得犯罪时牵连全家；三是安排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逃跑去处。宋江对自己的地位十分不满，尽管他善于“忍受”，但也免不了时常发泄牢骚。一次，他劝武松道：如得朝廷招安，便可投降，“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一个好名，也不枉了为人一世”。这些用来勉励武松的话，正是他自己梦寐以求的目标。接着，他怅然地说：“我自问自己，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一下子就暴露出他的忠而见疏、怀才不遇的怨恨心情。

宋江和当权集团的矛盾爆发，集中表现在吟“反诗”这个行动上。有人说：宋江的“反诗”，表明他决心反抗不合理的现实；从此，宋江开始了革命生涯。吟“反诗”表现了宋江什么样的思想状态？“反诗”到底反不反？

宋江上“杀惜”流落江湖后，命蹇事乖，不但没能“得进步”，反而成了囚犯，被“文了双颊”，配到江州。他独自一人，登楼饮酒，眼前的美景和双颊的处境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时他心里想的是：“目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利又不得，倒被文了双颊，配来这里。为不成建王朝效命的忠心，不被赏识，反而成了个被充军的囚犯，使这个以“猛虎”自喻的宋江再也不能“得进步”，在“不觉沉醉中”，无限心事“蓦上心来”，借酒醉吟诗，把这种心情直接表露出来了。在这里，他根本不是要反抗封建王朝，而是发泄了自己对“当道”的“欺压”的不满、抗拒附势的“刁钻之徒”黄文炳，把这两首诗说成“反诗”，是因为他一心想通过当权集团的大腿，“引荐取官，再做作官”，他抓住了宋江的把柄，当然要利用这个机会，去报功领赏

了。宋江对黄文炳把他的诗定为“反诗”并不认账，他十分委屈，万分恼火。大闹江州之后，他还向梁山起义军头领一再不厌其烦地解释，那是“一时间酒后狂言”，并无反意。可见，宋江的“反诗”并不反，宋江也不是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宋江平时装出一副“爱人”的面孔，惯使小恩小惠，经常给人买一副棺材板，给那人一点药钱。他的这一套本来是为了笼络人心，掩盖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的，所以当农民拿起武器造反时，他的反动立场就立刻暴露无遗，当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夺了要送给蔡京的“不义之财”后，他出于朋友的私情教了晁盖，但对晁盖等的革命行动却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是犯了“迷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晁盖等人以梁山泊为根据地，抗拒官兵，不断发展革命事业，他更视为大逆不道。他生怕受到梁山的牵连，所以“杀惜”后出逃，也不去梁山，而去投奔其他地主庄园。大闹清风寨后，宋江闯了大祸，曾“乘兴”投奔梁山，途中收到一封家书，使宋江立刻“迷途知返”，他大哭大闹，骂自己“不孝逆子，作下非为”，没有一点犹豫，连夜开了小差，回到了地主阶级的怀抱。回到家里遭到追捕，他表示宁可吃官司也不上梁山。他污蔑农民起义军是专门“杀人放火”的洪水猛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他宁可当“囚徒”，不愿当“匪徒”。在充军去江州的路上，他故意绕过梁山，恐怕被山上的人遇见拉去入伙。当梁山起义军请他上山入伙时，他以死相威胁，甚至连枷也不开，怕坏了“国家法度”。他说：“小可不争随顺了，便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里生何益？”看，他仇恨农民革命的反动立场何等顽固！

宋江和一切政治骗子一样，表面上堂堂正正，信誓旦旦，实际上是个贪生怕死的人。他甘心充军，不去梁山，是因为“朝廷册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书”，不去躲藏也没有掉脑袋的危险。在得阳江头，当真的遇到脑袋搬家危险时，他呼天叫地：“早知如此，苦且在梁山泊也罢。”后来，梁山起义军把他从刀口下救出，大闹了江州，此时，虽然他仇恨农民革命的思想丝毫没有变，但是再也混不下去了，“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宋江最后被迫上梁山，是由于往上爬的希望破灭了，连性命也保不住了，不得已，改换门庭，另搞一场政治投机，这哪里说得上是什么“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呢？

篡夺领导权 推行投降路线

宋江上梁山后起了什么作用？有些评论说：宋江上梁山后，作了一系列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事情；只因宋江上梁山，才有了“山寨的十分兴旺”，才使全军上下团结一致，等等。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要正确地评论宋江，最根本的就是要看他上梁山后推行了一条对哪个阶级有利，为哪个阶级服务的路线，是搞革命还是搞投降。离开了路线这个纲，就丢掉了分析宋江形象的根本标准。

在农民革命领袖晁盖掌权的一段时间里，梁山泊上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占主导地位。成千上万被压迫群

众“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积极参加起义队伍，打击封建统治者。广大群众在同封建统治阶级斗争中发挥了历史主动性，并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宋江的上梁山，不过是“勉从虎穴暂栖身”。通过封建仕途往上爬的路被堵死了，他就想混进革命队伍中找出路，用这种投机办法达到“尽忠报国”的目的。因此，上梁山以后，他就极力推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他利用各种时机大造投降主义的舆论：“专等朝廷招安，与国家出力”，“宋江等替天行道，并无异心”。为了推行投降主义路线，他还要阴谋诡计，以“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为借口，限制晁盖的行动，把晁盖架空，自己把实权抓到手。晁盖死后，宋江坐了“第一把椅子”，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把“聚义”改成“忠义”，一字之差，把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变成了以孔孟思想为基础的投降主义路线。他还通过“对天盟誓”，向起义军强行灌输“惟愿朝廷早降恩光，就免逆天大罪，众当竭力捐躯，尽忠报国”的思想，把投降主义路线强加到梁山农民起义军的头上。

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组织路线从来是为政治路线服务的。宋江为了推行投降主义的政治路线，极力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拚命网罗朝廷命官、富豪将吏，改变农民起义军领导班子的成分，构成投降主义路线的组织基础。宋江的这个反动目的，在千方百计拉卢俊义上山这件事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卢俊义是河北有名的反动大地主，对农民革命有共戴天之仇，他疯狂地叫嚷，要使梁山起义军“人人皆死，个个不留”，说什么“生为大宋人，死为大宋鬼。”就是这样一个人与农民起义军势不两立的反动地主分子，宋江却极为欣赏，看中了他们“生于富贵之家”，有“贵人”之相，“豪杰之誉”的身份地位，不惜用全山寨人马，拼死拼活地拉他上山。“只为人归水浒，致令百姓受兵戈”。上山后，又再三再四要卢俊义坐第一把交椅，以使“他时归顺朝廷，建功立业，官爵升迁，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只是在他口头上的坚决反对下，才叫卢俊义“坐了第二把交椅”，相反，宋江对农民起义军内部的革命派，却百般镇压，排斥打击。当李逵在菊花会上坚决反对李逵，一脚把桌子踢翻时，宋江登时大怒，几乎砍了李逵的脑袋。他实际上是在起义军内部煽惑，他要团结并依靠的只是那些一心跟着他走的投降派，哪里有什么“全军上下团结一致”？！

正如毛主席所总结的：宋江招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

当革命形势发展到高潮，梁山起义军对封建王朝形成严重威胁之际，也正是宋江叛卖革命成熟之机。

“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宋王朝对农民起义军武力镇压政策的失败，迫使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更

换策略，朝廷内部“招抚”政策逐渐占了上风，这就使宋江的叛卖活动具备了外部条件。从起义军内部看，由于宋江的苦心经营，

《水浒传》这部书，一边狂热鼓吹招安，宣扬投降，美化和歌颂投降派头子宋江；一边却极力诽谤造反，歪曲革命，咒骂和攻击农民起义领袖卢方腊。

《水浒传》百二十回本的第一百九回中引诗说道：

宋江重赏升官日，方腊当刑受刚时。善惡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

按《水浒传》所说：“一个‘重赏升官’，一个‘当刑受刚’，都是由于他们各自行‘善’作‘恶’的结果。

对于什么是“善”，有什么是“恶”，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看法。在反动统治阶级看来，被压迫阶级的一切反抗斗争，都是恶的；而俯首听命，逆来顺受，则是善的。与此相反，在被压迫人民看来，对反动统治阶级的反抗、斗争，争取解放是完全正义的，也就是善的；而反动统治阶级对于广大群众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却是罪恶大恶极，应该彻底清算。

《水浒传》这部书把宋江宣扬为“善”，把方腊污蔑为“恶”，这是哪个阶级的善恶观？

宋江这个出身于地主阶级的小官吏，是一个满脑孔孔孔孟之道的儒家信徒，他一生把“忠君”作为自己言行

投降主义路线已经处于统治地位，起义军领导班子内部已经形成了“朝廷命官过半”的局面，宋江已经牢固控制了领导权。当一百零八将全部上山，梁山农民起义军力量达到全盛时期的时候，他便在“大聚义”后的“菊花会”上，迫不及待地发表了政策声明：“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为了尽快取得朝廷的招安，宋江干尽了一切卑鄙无耻的勾当。他带人下山到东京，走皇帝宠宠李师师的后门，打通“枕头头上关”。又用重金贿赂朝臣，把“表情传达知今上”。当起义军活捉高俅后，宋江亲自把这个梁山的死对头扶上正座，纳头便拜，要他在皇帝面前说情，早日招安。更有甚者，他还直接向朝廷献策：“若以善言抚恤，我等尽忠报国，万死无怨”，示意皇帝要用儒家“仁政”，“恕道”来欺骗高俅等人。至此，宋江已经完全和朝廷当权集团同流合污了，在宋江的“山呼万岁，再拜谢恩”声中，起义军终于受了招安。招安后，宋江还十分恶毒地搞了个“梁山泊分金大买市”，把农民起义军多年积累的财富拍卖一空，使梁山起义军再无重新起身的可能。一场气壮山河的农民革命斗争，一个本来“十分兴旺”的农民起义“山寨”，终于被封建统治者通过宋江的手，不费一兵一卒就扼杀掉了。宋江又把“顺天”“护国”四个字写上了起义军的战旗，“强盗”变成了“官军”。宋江投降了，就双手打方腊。他双手沾满了农民革命的鲜血。鲁迅评《水浒传》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传》，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宋江是混入农民革命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理人，是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他在革命队伍中干了一系列坏事，干了对封建统治阶级损害不干于不成的事。他对农民革命不是有功，而是有罪，罪大恶极！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传》中宋江这个投降派，对于我们今天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是个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大量评论文章和近两年的一些评论文章，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鲁迅关于《水浒传》的论述，散布了不少阶级调和论、美化、歌颂《水浒传》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为宋江这个投降派做了种种辩护。一个基本论点是把宋江的投降主义算作“农民的局限性”。这些评论文章，不是把宋江说成“英雄”，“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就是用所谓“矛盾性格”来掩盖宋江投降派主义的真面目。这些错误观点，必须加以澄清。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水浒传》这部书，充分利用这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充分发挥宋江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吸取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学会在复杂的斗争中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善”

“恶”

“辨”

“善”

“恶”

“辨”

“善”

“恶”

“辨”

“善”

“恶”

“辨”

“善”

“恶”

“辨”

“善”

“恶”

“辨”

“善”

“恶”

“辨”

“善”

“恶”

哪个阶级的“及时雨”？

曹金兴

宋江是《水浒传》着意描写、竭力歌颂的一个人物。宋江第一次登场，作者就让他扛上一块“及时雨”的金字招牌，说他“为人仗义疏财”，对于江湖上的好汉，总是“尽力资助”。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是周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却把他比做天上下及时的雨一般，能救万物。”

自然界中的雨下得及时，对万物生长确实是有利的。但是，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难道会有对任何人都利超阶级的“及时雨”吗？压根儿没有。在阶级社会中，“对一些人好事，对另一些人必然是坏事”。让我们用马克

得再旺，直到“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推翻北宋王朝的黑暗统治。然而，他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却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迫不及待地篡改了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他开口“朝廷招安”，闭口“尽忠报国”，极力在农民起义军内部散布投降主义言论。在组织上，他更是加紧拉拢那些大地主和反动军官“入伙”，曾几何时，就改换了农民起义军领导集团的成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当朝廷派陈太尉上梁山招安，两次遭到李逵等人的抵制时，宋江眼看招安失败，在这节骨眼上又“及时”给农民起义军的敌人献计献策，让皇帝“以数句善言抚恤”，无耻地骗取农民起义军缴械投降。

宋江投降后，便自告

奋勇请求前去镇压方腊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这对宋徽宗来说，胜过“雪里送炭”，实在是太“及时”了。因此，这建议立即被朝廷采纳，封宋江为“平南都总管正先锋使”。宋江打方腊时，对于俘获的农民起义军将领，“推出斩了”尚嫌轻，“挖取心肝”方解恨。请看，宋江为统治阶级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是多么卖力，多么“及时”！

宋江临死之时，还念念不忘封建王朝的安危存亡，唯恐李逵再去“啃噬山林”，扯旗造反。不除李逵，宋江是死不瞑目的。他为了替宋王朝“及时”地清除隐患，也顾不得“周全人性命”，连夜把李逵召到身边，亲手将“结义兄弟”宋江药死。请看，这个农民起义军的无耻叛徒

的最高准则，对“官爵升迁”，“封妻荫子”，垂涎三尺。他被迫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之后，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一字之差，改变了晁盖的坚持农民起义的路线。随后，他进行一系列出卖革命的活动，为日后“归顺朝廷”作准备。最后还秘密上京都，乞求招安。在被招安升官之后，便凶相毕露，杀气腾腾，替朝廷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在镇压以方腊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时，宋江杀了许多农民起义军的将领，成了双手沾满农民起义军鲜血的刽子手。这就是所谓的“善”。它恰恰暴露了宋江的叛徒的丑恶面目，说明宋江是封建统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帮凶。

方腊，在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下，揭竿而起，率领千千万万受压迫的农民，把矛头指向封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建立农民革命政权，狠狠打击了腐朽的赵宋王朝。在地主阶级眼里，这就是所谓的“恶”。他恰恰表明了方腊敢于造皇帝的反，坚持革命，是广大农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这四句诗，赤裸裸地暴露了反动地主阶级立场。《水浒传》宣扬的善恶观，从反面给人们划清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可以使人民知道什么是投降派。

欢迎你，台湾骨肉兄弟

——访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台湾省体育代表团

向往北京 热爱祖国

在我国人民热情欢迎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的日子里，旅居海外和战斗在国内各条战线上的台湾省籍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怀着热爱祖国，解放台湾的强烈愿望，斗志昂扬地来到了祖国首都北京，参加全国各族人民的体育盛会。在这亲人团聚的幸福时刻，到处洋溢着动人的歌声：

“我站在海岸上，
把祖国的台湾省遥望。
日月潭碧波在心中荡漾，
阿里山林涛在耳边震荡。
台湾同胞我骨肉兄弟，
我们日日夜夜把你们挂在心上。
……”

这歌声倾注了祖国人民对台湾骨肉同胞的深情厚谊，也倾注了祖国人民和台湾骨肉同胞盼望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共同心愿。

台湾，这美丽富饶的海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

台湾省的骨肉同胞，你们日日夜夜向往着我们伟大的祖国，祖国人民也日日夜夜怀念着你们。

这次台湾省体育代表团参加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深深体现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一千六百万台湾同胞的亲切关怀，深深体现了台湾同胞和全国人民的战斗团结，也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坚强意志。

欢迎你，我们的台湾骨肉兄弟！
当你们远涉重洋，风尘仆仆地走下刚刚降落的飞机，或是走下北京车站刚刚停稳的车厢的时候，红领巾欢笑着向你们奔来，多少亲人扑上去和你们拥抱。一簇簇鲜花，一张张笑脸，都在热情地欢迎你们！我们的台湾骨肉同胞！

你们无论是来到紧张的训练场上，还是漫步在宾馆幽静的林荫路上，你们无论是站在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广场，还是去首都的工厂、学校和人民公社参观的时候，多少人向你们伸出热情温暖的手，多少双含笑的眼睛望着你们。

台湾省籍的运动员们，你们热爱祖国的一举一动都深深留在首都人民的心里。守卫天安门的警卫战士深情地说：每当我们站在天安门前金水桥上，或巡逻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常常被你们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动人情景所感动。你们站在这祖国举行盛典的地方，满怀激情地仰望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巨幅画像，仰望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仰望雄伟辉煌的天安门城楼，仰望巍峨庄严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久久舍不得离去。每当你们乘车去北京体育馆训练，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总是不停地唱起《我爱北京天安门》这首动人的歌，这是台湾同胞，向往北京，热爱祖国的心声啊！

欢聚一堂 情深道长

在台湾省体育代表团成立那天，旅居美国的台湾省籍运动员刘可梅的发言多么激动人心：“我们旅居海外的台湾同胞，虽然远离祖国，但是，隔山隔海，

隔不住我们热爱祖国的红心，我们向往社会主义伟大祖国，想念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她的话音刚落，掌声象春雷般响彻会场。

就在成立大会的舞台上，一群穿着高山族服装的台湾省籍男女同胞，随着优美的乐曲，跳起了高山族舞蹈。他们边唱边跳：

“我们冲过关山越大海，
来到毛主席身边，
各族人民亲如兄弟，
社会主义祖国多温暖。”

歌声和舞蹈刚一结束，旅居美国的台湾省高山族乒乓球运动员林绿就情不自禁地走到后台，和高山族同胞亲切会面。“看到你们，我多么高兴！”说着，她眼里流出了深情的热泪。

在中央民族学院担任教师的田中山是个高山族农民的儿子，他激动地对林绿说：“我们早就盼望着你们回来相聚，今天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那天，会场的一角坐着旅居日本的台湾省籍围棋选手、五十三岁的陈尧尧，他在人群中兴奋地见到了自己童年的伙伴——台湾省籍同胞蔡子民，原来，他们从小就同住在一个村子里。后来两人都离开台湾，一别四十二年，想不到如今在祖国首都重逢。陈尧尧兴奋地说：“我们能在祖国首都聚会，真是幸福！”蔡子民说：“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这里聚会的，我们为了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作出贡献。”

同胞相逢倍觉骨肉亲，军民欢聚更添鱼水情。八月二十六日和八月三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体育代表团和北京市体育代表团为了欢迎台湾省体育代表团，分别举行了盛大的联欢晚会。大厅里灯火辉煌，到处洋溢着喜悦和温暖。多少人眼睛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多少人紧紧地热烈握手，留个影吧，让我们永远记住骨肉兄弟的欢聚，让我们一起倾吐解放台湾的共同心愿。

参加晚会的台湾省籍老教练员、老运动员们，听着——一曲动人的音乐，一首首激情的诗篇，看着——一组组欢快的舞蹈，思潮翻滚。想过去，看今朝，谁能不百感交集！四十多岁的黄文浮和叶富贵，原来在台湾时，一个是矿工，一个是放牛娃，都受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他们回到祖国大陆后，才翻身作了新社会的主人。黄文浮现在在福建省革委会工作，叶富贵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

台湾人民的心情唱不尽，台湾同胞的苦难诉不完。《我们来到毛主席身边》，这是台湾省体育代表团乒乓球球队在晚会上集体朗诵的激情诗篇。他们的朗诵，象大海的波涛，汹涌激荡。旧社会的仇恨啊！象烈火在心中燃烧。今天呵！来到毛主席身边，心情激动，彻夜难眠。年轻的叶莉、叶叙姐弟俩，才来北京的那一天，妈妈从箱子里拿出姑姑的相片，向他们叙述姑姑苦难的少年。过去她是台湾省有名的短跑运动员，资本家为了多赚钱，逼着她拼命苦练，她劳累过度得了病，想去治病又没有钱，终于葬送了十八岁的年轻生命。今天，叶莉、叶叙姐弟俩，参加第三届全国运

会。
图为台湾省体育代表团和北京市体育代表团的运动员们在联欢会上。
本报记者摄

党给他们安排好幸福的一切，看看新社会，想想旧社会，心情怎能不激动！

台湾省体育代表团年龄最小的运动员，十一岁的王艳彤，也是晚会上朗诵诗的小演员。她刚一来到北京，就学会了唱《怀念台湾小朋友》这首歌。她用那清脆婉转的歌喉，动人地唱着：“望着祖国的地图，红小兵心潮翻腾，我们看见了祖国神圣的领土台湾岛，我们怀念台湾小朋友。高山挡不住春风，乌云遮不住阳光，祖国要统一，台湾要解放，颗颗心儿为着一个目标跳动，五星红旗总有一天飘扬在台湾岛上空。”

深切感受 共同心愿

祖国处处骨肉亲，祖国处处气象新。在全运会开幕以前，这些来自海外和全国各地的台湾省籍运动员，除了紧张的训练，还参观了工厂、学校，游览了首都的市容和名胜古迹，他们看到了祖国工业蓬勃发展的壮丽图景，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丰收景象，看到了我国各族人民的新一代沐浴着党的阳光雨露茁壮成长。社会主义祖国的一派大好形势，使他们感到无比自豪。他们打开照相相机，照了一卷又一卷胶片。他们说：“要把祖国欣欣向荣的景象带回去，让旅居海外的同胞都能共享这幸福。”

台湾省体育代表团部分运动员，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参观，工人们亲切地向他们介绍了厂里的情况，畅谈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体会。台湾省体育代表团成立时，印刷工人还为大会赶印了精美的请帖，许多台湾同胞都把这张请帖作为珍贵的纪念。他们来到北京中阿友好人民公社，受到了亲人般的热情接待，社员们把刚刚摘来的一串串新鲜的葡萄和飘着清香的苹果，端到亲人面前。尝着鲜美水果，他们感到象回到自己家一样温暖。他们来到清华大学，一进校门就受到革命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台湾省籍运动员和年轻的工农兵学员，一路参观，一路亲切交谈，畅谈友情，台湾省籍学员蔡宪和运动员们一起唱台湾民歌《渔早就出门》。临别时，大家依依不舍。

在同祖国亲人团聚的日子里，在同祖国亲人的交

谈中，许多台湾省籍的运动员心中有说不尽的感慨。他们说：“祖国大地繁荣富强，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但是，我们的故乡——美丽富饶的台湾岛，却沉浸在苦难里，日月潭的日月被遮得黯然无光，汹涌澎湃的海涛挟带着深沉的怒吼。一千六百万骨肉同胞还在水深火热中煎熬。回到祖国怀抱，使我们明白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才能拯救台湾人民。”他们激动地表示：台湾是中国的神圣领土，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妄图阻止解放台湾的阴谋，都将被英雄的中国人民彻底粉碎。富有斗争传统的、勤劳勇敢的台湾同胞，一定会早日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

祖国体育战线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强烈地激励着台湾省籍的运动员。棒球队教练陈相山，今年五十一岁了，他精神焕发，老当益壮。为开好第三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集训的日子里，他对队员的训练要求十分严格。他热情地鼓励全体运动员为开好全运会作出贡献。他说：“看到祖国体育事业在毛主席、共产党的亲切关怀下蓬勃发展，人民体质大增，真使人高兴。特别是涌现了许多年轻选手，他们生气勃勃，反映了祖国体育运动广泛开展，后继有人。更使人感动的是，体育新风尚蔚然成风，团结友谊之花到处盛开。这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可以比拟的。”

旅日台湾同胞黄和璧，在日本的一家饭馆当会计。白天干活，晚上要花钱才能练球，由于家中生活艰苦，交不起练球费用，练球机会很少。这次回到祖国以后，每当走进乒乓球馆，总是十分激动，她说：“新中国太幸福了！现在党给我们准备好了一切，我应该加紧训练，提高技术水平。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争光，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贡献力量。”

即将开幕的第三届全国运动会，是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这种团结胜利的气氛，现在已经充分地洋溢在各个练习场上。许多兄弟队都为台湾省体育代表团派来了优秀的教练，帮助他们训练。台湾省籍乒乓球队在集训的日子里，乒乓球教练陈国治和陆巨芳长期和他们在一起。乒乓球运动员梁克亮、李振伟、刁文元经常来队里传授技术，交流思想。

台湾省籍的运动员的心情和愿望，同全国各地运动员、全国各族同胞是完全相同的。山连着海，海连着山，台湾同胞和祖国人民的民心紧紧相连。

台湾一定要解放！台湾同胞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让日月潭碧波荡漾起欢乐的舞步，让阿里山林涛奏起动人的旋律，亲爱的骨肉同胞啊，我们总有一天要同你们团聚。让五星红旗飘扬在台湾岛上！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网球比赛开始进行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讯 第三届全国运动会网球比赛今天在四个场地同时开始进行。

参加今天团体赛的共有男、女各十个队，他们都打出了高水平，新风格。在北京体育馆网球场，上海女队和广东女队的一场比赛争夺十分激烈，持续了将近五十个小时。当比分打到二比二出现平局的时候，上海队的龚庆和广东队的黄燕屏上场。这两个年轻人打得猛，扣得准，动作敏捷，使场上不断出现拉锯局面，比分不相上下，一连打了十二局，各胜六局，最后只好采用平分决胜法，再赛一场，结果上海队胜七局多得一分，以三比二胜广东队。

在先农坛网球场，广东男队同台湾男队交锋不久，广东队接连获胜，场上比分为出现

二比〇。但台湾队毫不气馁，沉着应战。广东队的杨展同台湾队的刘快生上场交锋时，刘快生不慌不忙，用拉弧线球和高球的打法激杨展扣球，使杨扣球连连失误，刘快生以七比五胜杨展，为台湾队夺得一分，获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广东队最后以三比一获胜。

网球比赛从今天开始到二十五日结束，前后将进行三百六十一场，有男子团体、女子团体、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混合双打等七个项目。男、女团体比赛均分两个阶段进行，采用分组单循环制，每次由五场比赛组成，以先胜三场者为胜方。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混合双打，均采用单淘汰制，其中男子单打和双打采用五盘三盘制，其他采用三盘两胜制。



邮电部定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二日发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运动会》纪念邮票一套，共七枚。

左起：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认真看书学习；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体育为工农兵服务；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各民族体育运动蓬勃发展；新生力量茁壮成长。（新华社发）

从封建农奴制到社会主义的伟大变革

（上接第一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指挥下，和百万农奴一起迅速平叛了叛乱。接着，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在西藏展开了。这是百万农奴同反动的封建农奴主阶级一场决战，是农奴们自己起来解放自己的一场伟大斗争。他们没收了反动农奴主的庄园和土地，焚烧了文契，分得了土地，第一次占有了自己的劳动果实。罪恶的封建农奴制度被埋葬了，农奴们获得了解放，翻身做了主人，西藏实行了区域自治。从此，解决了西藏民族问题中首要的政权问题，这就为广大西藏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切实的保证。

西藏革命的现实说明：要解决民族问题，必须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经过民主改革，西藏的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变成了翻身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这种所有制随时都会发生两极分化，产生新的剥削阶级。因此不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就不可能真正解决民族问题。

西藏民主改革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百万翻身农奴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办起了两万多个互助组。接着从一九六五年开始，根据西藏地区的具体情况和特点试办了人民公社。亲身实践使翻身农牧民体验到组织起来的好处和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更加深入人心，广大翻身农牧民的社会主义

积极性空前高涨，整个西藏迅速掀起了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短短几年的时间，全区就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城镇私人商业和手工业，也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一伟大的胜利，标志着西藏民族和国内各兄弟民族一样，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这种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大大解放了生产力，西藏的农牧业连年获得丰收，在自治区成立后不到十年时间就实现了粮食自给。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工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西藏成了工人阶级和集体农牧民的天下，高原上出现了“民族不同阶级亲”的崭新的政治局面。

西藏革命的现实还说明：要解决民族问题，在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以后，还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事实说明，被推翻的封建农奴主阶级，人还在，心不死，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还需要继续努力，去彻底清除封建农奴制度遗留下来的垃圾，在这方面他们还有着雄厚的势力。小生产者还刚刚在改造，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在西藏同样是很顽强的，人民公社要不断地进行整顿。

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西藏百万翻身农奴，意气风发，继续革命。在普及、深入、持久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坚持批判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和孔孟之道，批判达赖集团集团的罪行，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他们勇敢地向封建农奴

制度的精神支柱“神权”宣战，大破“天命观”，横扫一切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

一支又一支翻身农奴的理论队伍出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象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西藏解放二十五年的历史，是一部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是百万农奴在党的领导下，打倒帝国主义、外国反动派及其支持下的封建农奴主阶级，推翻封建农奴制度，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不断把革命引向深入的历史。这场革命生动地证明了“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这一真理。

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不仅指出了我国劳动人民继续革命的方向，也为进一步彻底解决民族问题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西藏百万翻身农奴从自己亲身经历中深切地懂得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是民族压迫的根源，无产阶级专政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基石。他们清楚地看到，列宁缔造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些修正主义头子上台之后，由于颠覆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了资本主义，一个民族团结的大家庭又演变成了民族压迫的监狱。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决心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而继续努力奋斗。

（本报有删节）

乔森潘副首相以政府名义举行盛大宴会
欢迎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宾努亲王和夫人光荣返回祖国

柬电台指出柬埔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路线，获得解放，国际地位不断提高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讯 据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之声电台九月十日广播，柬埔寨王族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乔森潘九月九日晚上以柬埔寨王族民族团结政府的名义，在王宫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中央政治局主席、王族民族团结政府副首相宾努亲王和夫人，光荣返回祖国。

王族民族团结政府重要成员和各部主要干部参加了宴会。

乔森潘副首相和西哈努克亲王在宴会上先后发表了讲话。

宴会自始至终充满了团结战斗的热烈气氛。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讯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之声电台九月十日广播一篇社论说，柬埔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国际地位正日益提高。

社论说，在五年多的民族解放革命战争中，英雄的柬埔寨人民在柬埔寨革命组织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英勇卓绝的斗争。在这一斗争中，柬埔寨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克服了各种困难。

社论说，柬埔寨革命组织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路线是强大力量的源泉。

社论说，柬埔寨虽然人少国小、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但是由于柬埔寨人民坚持了这一条路线，就敢于反对拥有各种武器的最凶恶的帝国主义。

社论说，柬埔寨人民坚信自己的力量，相信自己的正义事业一定胜利，所以柬埔寨人民坚持进行斗争，决不后退，决不妥协，决不投降。

社论说，柬埔寨人民在斗争中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柬埔寨人民在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全部解放了自己的国家，获得了柬埔寨两千多年历史上空前的伟大胜利。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个弱小民族在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首次从自己的领土上完全彻底赶走了帝国主义。这一光辉胜利证明，只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进行斗争，小国就可以打败最大的帝国主义。

社论说，柬埔寨人民在坚持国内斗争的同时，还在国际舞台上开展了许多活动。

社论说，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率领柬埔寨代表团出席了一九七三年阿尔及尔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英萨利副首相率领柬埔寨代表团出席了今年利马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和联大第七届特别会议。

社论说，柬埔寨代表团的活动更加提高了柬埔寨的国际地位，引起世界人民的注目。

社论最后说，英雄的柬埔寨人民和英雄的柬埔寨革命军队在柬埔寨革命组织的英明领导下，以自己的鲜血在柬埔寨和世界的历史上写下了新的一章。柬埔寨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这是柬埔寨人民和世界人民值得高兴的事。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电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九月十日在人民文化宫观看了中国艺术团的演出。

朝鲜其他党政领导人康良煜、金东奎、崔贤、朴成哲、林春秋、杨亨燮、李用茂、金永南、柳章植、玄武光、许谈、孔镇泰，以及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负责人，人民军将领，平壤市劳动群众、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军战士出席观看了演出。

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主席韩德铎也出席观看了演出。

当日金日成主席等在乐曲声中走进剧场时，全场起立，长时间地热烈鼓掌欢呼。

中国艺术团团长长浩亮、副团长吕初敏，中国驻朝鲜大使李云川陪同金日成主席和朝鲜其他领导人观看演出。

中国艺术团今晚演出的歌舞和器乐独奏节目，受到了全场观众的热烈欢迎。整个剧场里始终洋溢着朝中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团结的热烈气氛。

金日成主席观看中国艺术团演出

观看后接见我代表团正副团长和主要演员

演出结束时，天幕上映出了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这时全场爆发出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演出结束后，金日成主席和康良煜、金东奎、崔贤等同志以

及韩德铎主席，由浩亮团长、吕初敏副团长和李云川大使陪同走上舞台同中国演员们逐一切握手，并赠送了花篮，热烈祝贺演

亮、副团长康成忠、吕初敏以及主要演员闵惠芬等，并同他们进行了极其亲切友好的谈话。



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九月十日在平壤人民文化宫观看了中国艺术团的演出。这是在演出结束后，金日成主席走上舞台同演员们合影。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金日成主席接见阿尔及利亚赞比亚代表团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电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九月九日接见了以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委员、阿尔及利亚宪兵司令艾哈

迈德·本谢里夫为团长的阿尔及利亚政府代表

团。接见时在座的有，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吴振一大将和有关部门负责人。

金日成主席同阿尔及利亚客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代表团是九月五日到平壤的。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电 据朝鲜中

和国党政代表团。

接见时，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党中央书记金永南，外交部副部长李成希在座。

金日成主席同赞比亚客人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代表团是九月四日到平壤的。

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五年九月四日电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九月四日发表社论，号召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党员和阿尔巴尼亚人民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社论说：“党和恩维尔·霍查同志一直十分关心对党员和劳动人民的马列主义教育”。

社论说：“深入学习、掌握和在实践中始终不渝地执行我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革命原则，对于党和工人阶级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因为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问题，这

阿尔巴尼亚《人民之声报》发表社论

号召党员和人民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同维护并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发生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蜕变的危险有关，同反对官僚主义、纯技术观点和唯智论的斗争有关，同进一步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贯彻群众路线、加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监督忠实执行党的革命路线有关。”

社论说：“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学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和为在我国杜绝产生修正主义而进行的斗争的经

验，应当紧紧地同本地区和基层组织的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并深入到问题的实质，用这些学说对照自己、同志和集体”。

社论说：“我们所处的形势，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包围及其对我们施加的压力，以及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方面的许多任务，要求进一步加强对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求每个党员孜孜不倦地、满怀热情地坚持学习，把自己的思想水平当作一项十分重要的和首要的任务，否则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就不能起到党员的先锋作用。”

庆丰收 话友情

——记卢旺达人民同中国水稻技术人员合作发展水稻生产

今年，卢旺达卡布耶稻区又一次获得水稻丰收。在当地农民举行的丰收大会上，一批男女青年举着镰刀和稻穗，欢快地跳起舞来。他们把一束束果实饱满的稻穗送给中国水稻技术人员，表达他们努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决心和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位于非洲中部的卢旺达拥有许多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盆地，适合水稻生长。可是，在殖民统治时期，大片土地荒芜了，水利资源未被利用，水稻更是从未种植过。在一九六二年卢旺达独立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卢旺达政府和人民在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中，不断发展水稻生产，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一九七二年，中国水稻技术组根据中、卢两国政府的经济技

术合作协定来到卢旺达，同卢旺达人民一起，为发展水稻种植共同战斗了三个年头，获得了生产和友谊的双丰收。

离首都基加利十公里的卡布耶，是卢旺达全国最大的水稻种植区，尼亚布戈戈河水灌溉着这里的土地。许多年来，这条河的上游水土流失严重，每到雨季，河水淹没大片土地，严重影响水稻生产。面对这种情况，卢旺达人民决心改变现状，根除水害。他们同中国技术人员一起，进深山，过沼泽，调查水源和流量，研究治水筑堤办法，制定施工方案。经过三个多月艰苦而紧张的劳动，卢、中两国人员用锄头和

铁锹修筑了长达七千三百八十米的河堤，为四十多公顷的土地解除了水害。尼亚布戈戈河水被驯服了，它按照人民的意志，淙淙流进稻区，浇灌着新开垦的稻田。

正当水稻生产展现出良好前景的时候，一九七三年七月，穆贡古利稻区发生了严重的旱情。稻田干裂，秧苗枯萎，水稻收成受到威胁。卢旺达农民在中国技术人员的支持下，决定因陋就简，在附近的河里打木桩，修建小型水坝，引水灌溉。两国人员一起，伐木、抬石、打桩，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为了早日建成水坝，卢旺达人员不畏艰险，多次潜入水下，堵塞坝底漏洞。经过几天夜以继日的紧张战斗，木桩水坝终于建成。清清的河水流进了稻田，秧苗返青，茁壮生长。一位卢旺达农业官员紧握着中国技术人员的手激动地说：“过去有一个西方国家的‘水利专家’，耗费了大量资金，在这里修建了一座所谓的‘永久坝’，可是一场大雨就冲垮了。而我们依靠群众，自己动手，只花了很少的钱，就修好了这个水坝，质量好，收效大。还是自力更生好！”

卢旺达开始种植的水稻是红米品种，产量低、质量差。在中国水稻技术组的协作下，经过深入调查、挑选和试验，现在已经成功地培育出一种为卢旺达人民所喜爱的新的白米品种。卢旺达

三年来，卢旺达的水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长，卢、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也在日益加深。

从中国技术人员踏上卢旺达美丽国土的第一天起，卢旺达人民，无论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天真活泼的孩子，都把中国朋友当成亲人，只要一看见中国人员，便招手致意，并且热情地说：“阿巴希努瓦，穆拉洛（中国朋友，您好）！”当中国人员缺少蔬菜时，他们就把新鲜蔬菜送到了中国人员的住地。当中国人员在劳动中不慎受伤时，他们就会赶紧帮助包扎。有一次，中国人员的汽车在途中抛锚，几位热情的卢旺达朋友同中国人员一起，硬是用肩膀把汽车推了几公里，一直推到中国人员住地。

在中国水稻技术人员回国的那一天，卢旺达朋友从四面八方赶来送行。许多卢旺达朋友送了一程又一程，拉着中国人员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中国人员也向卢旺达朋友频频回顾，依依惜别。

中、卢两国人民的友谊，如象长江和尼亚巴戈戈河一样，必将世代传代，奔腾向前。



卢旺达卡布耶稻区水稻丰收，这是卢旺达农业技术人员和中国水稻技术组人员在稻田里观察水稻长势。

新华社稿

李强团长离纽约回国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电 出席联大第七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于九月九日下午乘飞机离纽约回国。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外交部副部长雷霍·马利列和

副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拉科·纳乔，柬埔寨代表团副团长、外交大臣沙林察等。

中国代表团副团长、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和代表团其他成员也到机场送行。

美总统福特会见我国国际贸促会代表团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十日讯 华盛顿消息：美国总统福特九月八日下午在白宫会见了以李川为团长的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团。会见时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座。

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应邀参加了会见。

美国方面参加会见的还有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

助理斯科罗夫特将军、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主席休伊特、理事长菲利普斯等。

福特总统对代表团访问美国表示欢迎，并要代表团转达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问候。

会见前，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设

宴招待了代表团，出席宴会的有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斯科特、众议院议长艾伯特、众议院少数党领袖罗兹等参、众两院议员。

同日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举行宴会欢迎代表团。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代表团是在九月六日到达华盛顿进行访问的。

我国和墨西哥签署科学技术合作协定

新华社墨西哥城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墨西哥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九月九日下午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签署。两国政府还就一九七五年文化交流项目进行了换文。

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姚广和墨西哥外交部长埃米略·奥斯卡·拉瓦萨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这项协定上签字。

参加今年“人和他的世界”国际博览会中国馆闭幕

新华社渥太华一九七五年九月三日电 由蒙特利尔加拿大—中国协会举办的参加一九七五年“人和他的世界”国际博览会的中国馆九月一日晚间闭幕。

自从六月二十七日开幕以来，三十万多人参观了该馆。他们当中有加拿大各阶层人士以及来自美国和其他国

家的人们和在加拿大的华侨。参观者对展出的中国国画、玉雕、牙雕和其他手工艺品以及图片等展品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这些展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许多观众认为，这次展出有助于促进加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相互了解。



比利时马列主义共产党与荷兰马列主义党发表联合声明

欧洲和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结成反霸统一战线

揭露苏美口谈“缓和”加紧争夺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新华社布鲁塞尔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电 比利时刊物《光明和被剥削者》最近一期刊登了比利时马列主义共产党和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一份联合声明。

声明说：“最近，荷兰马克思列宁主义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与比利时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进行了会晤。两个代表团对当前的形势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对会谈中谈及的所有问题，双方看法完全一致。”

声明指出：“两党认为，革命斗争的中心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俄国社会帝国主义两个超级大国，争取民族独立。”

声明揭露说：“两个超级大国在谈论‘缓和’和‘持久和平’。尽管它们有时联合起来反对人民，以窒息和扑灭革命火焰，但它们的

谅解是暂时的。它们的争夺是绝对的；它们的伎俩、冲突和阴谋是世界不安宁的根源，它们在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声明说：“在美帝国主义和俄国社会帝国主义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美帝国主义是正在衰落的帝国主义，它刚刚遭受了一些永世难忘的军事失败，经历着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它的货币在崩溃；它在无数困难中挣扎着，它在世界各地都在后退。”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要求对世界重新进行有利于它的瓜分”。

声明指出，欧洲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猎物，这是它们争夺的焦点。

声明强调说：“俄国社会帝国主义使欧大部分地区处于殖民依附状态。它施展各种伎俩，以把它的势力扩大到整个欧洲。它在

那里的侵略潜力已超过美国和北约组织的潜力。”

声明指出，“现在，俄国社会帝国主义成了欧洲最大的危险，因为它用红旗掩盖着它的侵略阴谋和卑劣行径，因而能欺骗许多劳动者”。

声明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应该坚决进行宣传，以便联合和加强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斗争。他们应该促进把欧洲各国和人民团结起来、把西欧各国同历史的推动力——第三世界——团结起来的广泛的战线。”

声明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人应该勇敢地支持和促进争取民族独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和俄国社会帝国主义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共同努力，会议同意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属的十三个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

的投票权从原有的百分之五扩大到百分之十三，达到三百九十分别提款权（相当于十七亿四千万美元）提高到三十八亿五千六百万特别提款权（相当于四十六亿美元）。会议还决定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百分之三十三，达到三百九十分别提款权。

会议同意废除黄金的官价制度，并决定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掌握的黄金按自由市场价格出售六分之一（约二千五百万盎司），将其利润（约二十五亿美元）作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信托基金。由法国提出的关于以固定汇率代替浮动汇率的问题，虽然取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但由于美国、西德等国家的反对，没有达成协议。

是前门的狼？还是后门的虎？

新华社记者述评

苏联代表马立克九月三日在联大第七届特别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同会议的宗旨背道而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处处对立的讲话。

广大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打破旧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第三世界一些国家的代表还着重指出，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压迫、控制、掠夺和剥削是第三世界发展民族经济的最大障碍。

可是马立克在发言中却大唱反调说：“我们永远不会接受那种认为世界分为‘穷’国和‘富’国或者分为‘北方’和‘南方’的错误概念”，并且慌忙不迭地为自己表白说，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不负任何责任”。但是，空口白舌改变不了事实真相，掩盖不了苏联这个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的行径。

两个超级大国加紧掠夺原料、市场，加强对第三世界的掠夺和控制，不仅是为了经济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准备侵略战争。这种情况已引起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满。他们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也是针对两个超级大国扩军备战、侵略扩张的计划。

正因为如此，马立克在会上颠倒事实，大讲什么目前世界形势的特点是“持续不断的缓和紧张局势，减少战争危险”，甚至一再要求这次特别会议“特别注意裁军问题”。尤其可笑的是，马立克还装腔作势地提到目前世界各国的“军备竞赛和军费开支总额空前地达到每年三千亿美元”之多，似乎苏联对“裁军”是最认真的了。可是，只要对这三千亿美元的费用略加分析，真相就大白，原来其中中美两家的军费就占了近三分之二，而且其中苏联的军备和军费增加得最多、最快、最为“专注和坚定”。然而正是这个苏联的代表却要求会议“专注和坚定地谋求解决裁军问题”，这是别有用心地妄图以粉饰太平来麻痹人民，掩盖苏联的疯狂扩军备战，以“裁军”空谈来转移斗争目标，把会议引入歧途。

发展中国家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展民族经济，要求摆脱新老殖民主义的控制和剥削。可是，马立克却十分卖力地兜售苏联的新殖民主义货色。他把“经互会”的一套什么“国际分工”、“经济一体化”之类的东西，都拿出来叫卖，要第三世界国家同苏联搞“工业合作”，让“苏联的组织参加建设一些企业”，企图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推销陈旧的机器设备，掠夺原料，剥削廉价劳动力，取得超额利润，逐步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他打着反对西方“跨国公司”的幌子，实际上推销莫斯科牌的“跨国公司”，打着“援助”的旗号，实际上要达到控制的目的。

马立克的发言充分暴露了苏联企图以偷梁换柱的手法，转移会议的方向，力图制造“缓和”假相来掩盖其扩军备战、扩张争霸的野心，鼓吹“国际分工”、“经济一体化”等来扩大其势力范围，反对区分穷国富国来掩盖超级大国同被压迫被剥削人民和民族的矛盾，把第三世界的反殖、反帝、反霸斗争引入歧途。

中国代表团团长在大会上的发言对这个超级大国的政策作了实质性的剖析，触到了它的痛处。

马立克跳起来破口谩骂，帽子一大堆，什么“大国沙文主义”、“对世界霸权的贪得无厌的欲望”等等，但是却拿不出任何一点事实根据，徒然暴露了这个超级大国横蛮无理、霸权主义的面目，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难怪一位发展中国家代表在马立克发言后当面问他：你是前门的狼呢，还是后门的虎？问得马立克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发展中国家代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

谴责超级大国转嫁危机 要求改革国际货币制度

新华社一九七五年九月六日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九月一日到五日和华盛顿举行第三十届年会。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日益深化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年会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强烈谴责发达国家特别是超级大国转嫁经济危机，要求改革国际货币制度。

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的领导人和代表则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形势表示焦虑不安。

本届会议主席、委内瑞拉计划部长罗德格斯说，富裕的工业国正在牺牲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下从世界性衰退中谋求恢复。他表示决不能再容忍这种局面，“我们必须毫不迟缓地集中我们的力量，为克服目前发展中国家所处的丧失权利和绝望的状况奠定基础”。

肯尼亚财政和计划部长基巴卡巴代表发展中国家（不包括南非）发言，指出非洲各国生产的可可、咖啡、铜和木材的价格正急剧下跌。他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挽救非洲经济免遭灾难”，并要求“不再耽搁”地找到改革国际货币制度的公平和公正的解决办法。

巴拿马经济计划部长贝尔索塔代表拉丁美洲十九个国家和菲律宾发言说，由于世界贸易和金融市场上的激烈动荡，“我们可能失去我们自一九五八年以来辛辛苦苦获得的许多进展”。

尼泊尔财政大臣塞巴说：“我们都意识到发展我们各自的经济是建立在我们自己的努力之上的。”他介绍了尼泊尔发展民族经济的成就，并且说，发展中国家对石油出口国的援助表示感谢。

美国和其他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大国则对当前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形势深感不安。美国总统福特在会上说：“甚至在衰退的过程中，通货膨胀仍然以一种高得令人难以忍受的速度继续发展着。”要在“全世界重建一个持久的、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发展时期将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英国财政大臣希利说：令人沮丧的困难是“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的并发症。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困境。”

“今年冬天将是一个困难的冬天。”他还说：在明年年中以前（经济）不能有什么指望。西德财政部长阿佩尔说，西方世界的失业情况已高到“完全荒谬”和“不能容忍的地步”，这个问题应该受到“最高度的重视”。他还说：“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再度编起通货膨胀”。

日本可能永远不会再象六十年代那样经历一个持续的高经济增长率的时期了。经过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努力，会议同意石油输出国组织所属的十三个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

的投票权从原有的百分之五扩大到百分之十三，达到三百九十分别提款权（相当于十七亿四千万美元）提高到三十八亿五千六百万特别提款权（相当于四十六亿美元）。会议还决定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提高百分之三十三，达到三百九十分别提款权。

会议同意废除黄金的官价制度，并决定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掌握的黄金按自由市场价格出售六分之一（约二千五百万盎司），将其利润（约二十五亿美元）作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信托基金。

由法国提出的关于以固定汇率代替浮动汇率的问题，虽然取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但由于美国、西德等国家的反对，没有达成协议。

会议同意废除黄金的官价制度，并决定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掌握的黄金按自由市场价格出售六分之一（约二千五百万盎司），将其利润（约二十五亿美元）作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信托基金。由法国提出的关于以固定汇率代替浮动汇率的问题，虽然取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但由于美国、西德等国家的反对，没有达成协议。

会议同意废除黄金的官价制度，并决定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掌握的黄金按自由市场价格出售六分之一（约二千五百万盎司），将其利润（约二十五亿美元）作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信托基金。

由法国提出的关于以固定汇率代替浮动汇率的问题，虽然取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但由于美国、西德等国家的反对，没有达成协议。

会议同意废除黄金的官价制度，并决定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掌握的黄金按自由市场价格出售六分之一（约二千五百万盎司），将其利润（约二十五亿美元）作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信托基金。

由法国提出的关于以固定汇率代替浮动汇率的问题，虽然取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但由于美国、西德等国家的反对，没有达成协议。

会议同意废除黄金的官价制度，并决定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掌握的黄金按自由市场价格出售六分之一（约二千五百万盎司），将其利润（约二十五亿美元）作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信托基金。

由法国提出的关于以固定汇率代替浮动汇率的问题，虽然取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但由于美国、西德等国家的反对，没有达成协议。

会议同意废除黄金的官价制度，并决定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掌握的黄金按自由市场价格出售六分之一（约二千五百万盎司），将其利润（约二十五亿美元）作为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信托基金。

由法国提出的关于以固定汇率代替浮动汇率的问题，虽然取得非洲国家的支持，但由于美国、西德等国家的反对，没有达成协议。

画皮岂能掩盖真相

——揭露苏修“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的社会帝国主义本质

陶 秋

联大第七届特别会议刚开幕，苏修宣传机器就又挂着“天然盟友”的破招牌，向第三世界国家贩卖所谓“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合作”的黑货，同时大肆吹嘘苏修同亚非拉国家的“经济联系”，说什么这种“联系”“有助于巩固它们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

但是，无数事实证明，苏修的所谓“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和“联系”，实际上是它对外推行新殖民主义和世界经济霸权主义的工具。

名为“平等互利”实则剥削掠夺

所谓“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是苏修向第三世界输出资本、进行掠夺和剥削、攫取最大限度利润的一个重要工具。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三年间，苏修除了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外，还通过“经济合作”形式输出了一百五十五亿美元的国家垄断资本。

苏修利用资本输出，力图把第三世界国家变为它的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和食品、农矿原料的供应基地。苏修以“经济合作”和对这些国家的“援助”为名，以垄断高价向发展中国家出售大量的工业制成品。据统计，在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四年间，苏修向发展中国家高价推销了一百九十一亿美元以上的工业制成品，其中机器设备占百分之六十八，达一百三十亿美元。与此同时，它从这些国家换取了二百一十七亿美元以上的初级产品。必须指出，许多商品是第三世界国家为了抵偿债务，被迫以低廉价格卖给苏修的。一九七四年，发展中国家向苏修偿还苏修债务的商品就占苏修从这些国家进口总值的百分之五十。

苏修吹嘘，它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是“建立在互利和完全尊重双方利益的基础上的”。但是，事实完全驳斥了苏修的这种鬼话。苏修同第三世界国家在工业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交换中，大搞贱买贵卖，进行惊人的剥削。据估算，一九五五年到一九七三年间，发展中国家同苏联的贸易中由于贸易条件恶化而蒙受的损失约达一百一十三亿美元；其中埃及损失二十一亿美元，伊朗损失近七亿美元，至于那些同苏修进行“经济合作”比较密切的伙伴，如印度之类的

国家，它们遭受的损失就更为严重。在上述时期内，印度的损失达二十二亿美元之巨。这些事实充分说明苏修搞的这一套完全不是什么“平等互利”，而是彻头彻尾的损人利己！

控制经济命脉损害主权独立

从五十年代中期，特别是六十年代以来，苏修在经济“合作”的名义下，不断地加快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扩张的步伐，把黑手伸进了近五十个发展中国家。苏修渗透到了这些国家的计划、工业、农业、电力、运输等重要经济部门，参与了大约一千个工业和其它项目。苏修通过这些“援”建项目，力图控制受“援”国的经济命脉，阻挠它们的经济发展，使它们在经济上永远对苏修处于依赖和从属的地位，从而为苏修对它们进行政治上的控制打开道路。就拿苏修喋喋不休地吹嘘的它同发展中国家“有成果合作的样板”的印度来说吧，从一九五五年苏、印签订第一个“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以来，苏修在印度“援”建的大企业达六十八家。这些企业，从选择厂址、设计、施工、安装到产品分配的各个环节，都在苏修的控制之下。特别是六十年代末以来，苏修在印度大力推行“协调”计划，“生产合作”、“生产专业化”等新殖民主义计划，把印度的钢铁、机器制造、发电和其它重型工业都抓到苏修的魔爪之中。苏修甚至迫使印度设立专门厂子，按照苏修规定的规格、品种、数量进行生产，以规定的价格向苏修出售。这种“经济合作”严重地损害了印度的独立和主权，这样下去，势必使印度沦为苏修的殖民地 and 附属国。苏、印“经济合作”这个“样板”，活生生地勾画出苏修所谓“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的图景，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认清苏修“经济合作”的反动本质。

苏修还把开办“合股企业”作为它同发展中国家“经济合作”的一种主要形式。这种企业，实际上是西方“跨国公司”的翻版。据不完全统计，苏修已在十五个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开采工业、加工工业、贸易、运输等经济部门开办这种企业。通过这种企业，苏修在第三世界倾销陈旧的机器设备，掠夺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马来西亚《阵线报》曾对苏修的“合股企业”揭露说，它同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开设的“联合企业”是“完全属于同样一个性质的东西，它是大量剥削劳动人民的无耻行径”。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这类企业的数目正在迅速增加，仅一九七四年就开办了五家。但是，苏修并不以此为满足，它们正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大搞所谓“经济综合体”，并且声称，要“越来越广泛地运用”这种“合作的新形式”。人们知道，这种所谓“经济综合体”，就是苏修在一些东欧国家推行的超国家的大型联合企业。苏修利用这种形式，剥夺了一些东欧国家独立自主发展国民经济的权利，迫使这些国家处于对苏联的依附地位。

苏修“大家庭”的样板说明了什么

近年来，苏修大力吹嘘说什么它同第三世界的“经济合作”不仅增进了“新型的国际经济关系”，而且有助于这些国家“参与全新的国际分工”。它甚至要发展中国家“广泛地运用”它在“经互会范围内采用的方法”和“经济一体化经验”，走“一体化道路”。这就暴露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妄图通过“经济合作”，把它在一些东欧国家搞的那套“国际分工”、“一体化”、“协调”计划、“生产合作”、“生产专业化”等推行新殖民主义的办法推广到第三世界，以便把第三世界国家纳入它的势力范围，加强它同美帝争夺世界霸权的阵地。

所谓“经互会”的“经验”究竟是什么呢？众所

周知，苏修在它那个“大家庭”中，采用高压手段，强制推行“国际分工”和“经济一体化”，建立了一个以它为霸主的社会主义经济剥削体系。在这个经济体系中，苏修的经济占居垄断地位。据透露，苏修一国就占它那个“大家庭”工业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五，农业产值的百分之六十，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七十，投资的百分之八十，科学开支的百分之六十六，对外贸易的百分之四十。苏修正是凭借着经济上的这种优势，在一些东欧国家推行弱肉强食的经济霸权主义政策，蹂躏别国主权，控制和摧残它们的经济，把这些国家变为它的经济附庸。难怪波兰《人民论坛报》曾对苏修的“经济合作”抱怨说：“哪个国家的经济水平越高，这个国家就越容易在合作中取得自己的地位和获得越大的经济利益。”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通过许多超国家的经济合作组织和高度垄断的大型联合企业，控制了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计划、工农业生产、财政金融、对外贸易、运输电讯、科学技术等关键的经济部门。这就是苏修同一些东欧国家的“兄弟合作”和所谓“新型的国际经济关系”的真相，也是苏修要第三世界国家参与它们的“国际分工”和要通过“经济合作”增进的所谓“新型的国际经济关系”的真正目的。

苏修利用“经济合作”来控制、剥削和掠夺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激起了各国人民的强烈反抗，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认清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豺狼本性。它鼓吹“国际分工”的社会帝国主义阴谋，正在日益破产。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明确提出，必须“摒弃国际分工这样的陈词滥调”。苏修要求发展中国家参加它们自己的“经济一体化”，也遭到莫落，连印度这个苏修“经济合作”的“样板”也不愿干。苏修正在以“经济合作”为名，加紧打入东南亚，但是它这个“罪恶的慈善家”的真面目日益暴露。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前门拒狼”的同时，正在警惕“后门进虎”。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步认识到：依靠超级大国的“经济合作”来发展民族经济是靠不住的，往住是危险的；唯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才是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康庄大道。苏修想利用第三世界国家要求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愿望，混水摸鱼，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它的殖民帝国，肯定是费尽心机的。